

【客家学研究】

论牙买加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

黎相宜^{1, 2}, 陈送贤^{1, 2}

(1.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广州 510275; 2.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当代牙买加华人以客家人为主,其原乡主要是东莞、惠州惠阳区和深圳宝安区、龙岗区等地。牙买加客籍移民将采取社会行动修补在跨国空间下社会地位落差形成的不一致性,并以个体为单元或社团的形式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内开展政治互动。他们在祖(籍)国、移居国乃至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进行人员、资金、信息与观念的流动、转换与整合,开展一系列跨国政治实践,以谋求经济利润的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政治风险的分散。牙买加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情境性和可变性。

关键词:牙买加;客籍移民;跨国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 D81/K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20)01-0009-06

当代牙买加华人以客家人为主,目前有2~3万人,主要分布在金斯顿、蒙特哥贝、圣安东尼奥港,其大规模的迁移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广东惠东宝地区(今东莞、惠州惠阳区、深圳宝安区、龙岗区)的大量客家人作为“契约劳工”被输送至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不少华工合同期满后,发展出介于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零售业经济,在高度种族隔离的社会结构中夹缝生存。20世纪20年代中期,牙买加30%的零售业执照都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改革开放后,上述地区的客家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申请签证进入牙买加,其中大部分持劳工签证。新移民需要为雇主(通常也是亲戚朋友)工作两到三年,偿还迁移债务后,才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新开零售店铺。

客籍移民在牙买加生活面临着许多风险,有的客籍移民抱怨自己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在赚“棺材本”,足以体现他们在当地生存的不易。客籍移民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来到牙买加发展,本身怀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提升社会地位的抱负。当这一愿望在牙买加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并且他们积攒了足够的资本,牙买加客籍移民将采取社会行动修补在跨国空间下社会地位落差形成的不一致性。^[1]他们或以个体为单元,或成集体(社团)的形式横越不同的民族国家,加入与更多国

家(地区)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政治互动,作为对在牙买加“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社会境遇的回应。

一、牙买加客籍移民跨国政治实践的路径选择

(一)客籍移民的多层公民权

客籍移民借由其在牙买加的社会网络协商出有利的生存条件,但大多数牙买加客籍移民仍然被隔绝于当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脉络之外。在全球化与跨国主义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自身的边缘性地位,多线层、多维度、多形态地不断穿越不同的民族边界,以期实现在多重社会空间下的利益最大化。尽管现今全球化促成了许多个体频繁地跨越国界,以“世界人”的尺度经营事业与生活,但他们的生命机遇仍受限于民族国家的制度规范,必须在不同国度之间转换身份,使自己维持“弹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2],以灵活地、机会主义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状况。

在协调多层公民权的过程中,牙买加客籍移民首先会把目光投向祖(籍)国。许多移民本身维系着连结移居国与祖(籍)国两地之间家庭、经济、社会、宗教与政治纽带,过着一种跨国度的生活。^[3]因此,协调与祖(籍)国的政治身份认同相对容易操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其外交影响力在加勒比地区的扩大,许多牙买加客籍移民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有增无减,他们大多会把中国人政治身份认同作为协调多层公民权的第一层。据笔者了解,2008年后前往牙买加务工、经商的客籍移民,尽管他们基本都能获得申请牙买加护照的资格,但大多已不再像过去的华人一样轻易选

收稿日期:2019-09-18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2019年度招标课题(19KYKT03)。

作者简介:黎相宜(1985-),女,海南文昌人,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华侨华人研究、侨乡研究、国际移民;陈送贤(1995-),男,东莞凤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华侨华人。

择放弃中国国籍。在牙买加,他们的交际圈主要集中在华人群体,外出旅行往往和“中国人”结伴,平时聚会的茶友、牌友大多都是操同一方言的老乡。有的客籍移民甚至在访谈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当地人的偏见:“‘中国人’捞^①那些‘乌鬼’不一样。”这种“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的表述,反映了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强烈中国人政治身份认同。他们通过保留中国人政治身份认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布局在不同场域的利益,比如在中国家乡的村集体经济分红,F镇Y村从2008年起规定仅本村户籍村民才有资格参与村集体经济分红。一些早先加入牙买加、苏里南等国国籍的外籍华人,在协调公民权的过程中,出于对利益的追求,也开始把目光转移回祖(籍)国,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求恢复中国国籍。然而在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下,这种操作的难度非常高,但还是有不少外籍牙买加华人在不同的政治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要求祖(籍)国政府重视他们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诉求。F镇某地方官员这样观察这种现象:“以前还不见有这么多‘华侨’反映这个问题,但这几年来感觉有些‘华侨’有点迫不及待想要拿回中国国籍了。但很遗憾的是,放弃中国国籍容易,但之后想要重新恢复应该是世界上最难的,有钱都帮你办不了^②,你看那些拿到了中国‘绿卡’的老外都能上新闻了。”

在协调多重公民权的进程中,祖(籍)国公民身份是牙买加客籍移民进行身份策略优化的选项之一。这种策略选择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当“中国护照什么人用”时,客籍移民转向选择移居国护照或者争取发达国家护照。而当祖(籍)国护照价值逐渐上升时,牙买加客籍移民自然地吧协商公民身份权的眼光放回祖(籍)国,以满足不同情境变化下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二) 全球政治中的弹性公民

在全球化时代,牙买加客籍移民的跨国模式不再只是遵循着“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而是在“衣锦还乡”的同时孜孜追求着“发达国家(地区)公民梦”。他们游走于多重政治版图与全球贸易中,维系着与祖(籍)国、移居国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利益相互关联的“国家-海外公民”关系。

陈志安的个案充分反映了在全球跨国政治中牙买加客籍移民追求“弹性公民身份”的灵活性。1962年,陈志安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并在当时取得了香港身份,在香港生活了5年之后,陈志安在亲戚的帮助下前往苏里南务工,并在当时加入(荷属)苏里南国籍。1982年,受苏里南动乱的政局影响,陈志安带着全部积蓄,跟几位好友考察了周边几个国家后,最终选择在牙买加投资开厂,并新获得了牙买加护照。但因为苏里南不允许双重国籍,陈志安只能放弃苏里南

国籍。2004年,陈志安投入30多万加币,在多伦多万锦市(Markham)以买地建别墅的投资方式取得了加拿大国籍。另外,陈志安表示,香港的外事部门曾经联络过他,要求其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但因年代久远以及长期在各国奔波遗失过相关文件,陈志安选择了放弃香港护照。在陈志安看来,牙买加以及加拿大两本护照足以满足其国际旅行的需求。陈志安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国籍,足以体现其不同社会境遇下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关切。

李华军流动与多变的跨国实践也体现了牙买加客籍移民在全球流动中转换多层公民权的灵活性:20世纪80年代末,李华军离开家乡,在叔公的帮助下过境香港辗转来到牙买加,在当地靠零售业发家,成为牙买加当地著名的侨领。李华军将子女送往加拿大留学,而后孩子们定居多伦多。早年发家之后他在香港购买了一处房产。目前李华军不仅手持加拿大护照,还同时拥有牙买加和中国香港的永久居住权,常年往返于多伦多、金斯敦以及香港、东莞等地。在多伦多,他除了照顾孙辈,还积极融入当地华人圈,与朋友们一起听粤剧、打麻将。在金斯敦,他将生意交付给侄子自己退居幕后,其重心主要放在牙买加客籍移民社区发展以及社团事务中。此外,他除了经常拜访香港的亲戚朋友,还积极回东莞参与家乡的政治活动等。李华军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牙买加、中国与加拿大,积极为牙买加客籍移民社会、牙买加当地政府以及中国政府搭建交流平台。

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加,对移民界定各要素中有关“永久性居住”这一要件已经不合时宜。许多牙买加客籍移民拥有当地身份,这一现象意味着牙买加公民身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现实的方法,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每年到政府机构续签临时签证带来的麻烦和花销。同时也能方便客籍移民在牙买加顺利地展开其行动,吸纳和开拓在牙买加的各种资源、关系和文化特质。

这种建立在多本护照或“永久居住权”上的多层公民权,能够帮助牙买加客籍移民建立跨国界的商业及社会连带,不仅可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以利理财节税,也能让子女获得在祖(籍)国以外侨身份入学的便利,享受在横越多重领土生活中作为“世界人”的特权。中国人从牙买加再移民或申请当地“绿卡”证明了本尼迪特·安德森的论点,即护照“越来越不能成为身份的证明,更不用说对起保护作用的民族国家的忠诚,只是对参与劳务市场的证明”。

当代的民族国家是“全球市场中有国界的国家”(Bounded States in a Global Market),牙买加客籍

① 客家方言,意思是“和”。

② 有钱都无法重新恢复中国国籍,笔者注。

移民在国际迁移的洪流中透过能动性 (Agency) 的施展,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空间中协商公民身份和实现角色转换, 来展现经济能力以及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二、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参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 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海外华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更加重视对华侨华人资源的动员, 从各个层面建立与海外华人的联系, 并为海外华人回国谋求事业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一些牙买加客籍移民纷纷响应祖 (籍) 国的号召, 以不同的形式加入与祖 (籍) 国的跨国政治互动。比如, 积极参加由祖 (籍) 国各级政府组织的座谈会。

(一) 返乡参加座谈会

牙买加客籍移民参与到与祖 (籍) 国政治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 除了少数能以“特邀政协委员”身份列席政协会议或者受邀参加高端华人论坛的侨领外, 大多数普通客籍移民只能接触到由地方政府组织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 牙买加客籍移民与地方官员直接进行对话, 反映他们在祖 (籍) 国遇到的困难, 并要求地方政府尽快予以有效协调, 以最大限度争取自身利益。

东莞市 F 镇政府会在每年的清明节、“荔枝节”期间组织两场大型的座谈会, 邀请党政机关负责人、村干部、海外乡亲以及媒体记者参加。2019年清明期间, 蔡宇华作为牙买加华人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蔡宇华表示,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重点向统战部门负责人张局长反映了牙买加客籍移民回乡建房申请无法得到审批、以及审批慢等问题: “一些‘老华侨’把破旧的祖宅老屋拆除后, 因为建房申请不能得到审批, 导致工地迟迟无法开工。发生这种情况非常尴尬, ‘老华侨’只能在返乡期间暂时在外面租房子住, 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蔡宇华表示, 许多乡亲都在这次座谈会上反映同样类型的问题。但 F 镇的某官员事后的解答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现在 F 镇每年只允许报批 150 栋房屋, 并且对于房屋的报建层数有着严格的规定, 任何人一旦‘抢建’、‘违建’, 城建部门都会依法拆除。其实这帮‘老华侨’不缺房子住, 他们这么着急想快点建好房子, 其实是为了能早点建好房子租出去, 有些还想着等拆迁到他那一片时分到更多的拆迁款。一开会的时候就反映这些问题, 有些‘老华侨’还要求给他们做 (作) 特殊处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所有群众都要平等对待的, 都必须排队, 你跟谁反映也没用快不了。再说了, 没有经济利益的话, 他们至于这么拼命争取嘛, 以前也不见得他们这么热烈反映啊。”座谈会后, 牙买加客籍移民会通过不同的方式保持与地方官员的联络。有些甚至会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通过不同的渠道给地方官员“施压”, 比如

一些外籍牙买加客籍移民会联络其所在国的驻华领事馆, 要求领事馆出面与中国政府沟通, 导致最终可能演变成“外交事务”; 一些原籍宗族势力雄厚的牙买加客籍移民, 会求助村中的“族老”, 希望“族老”出面“疏通关系”; 有些则会联系上一级的统战部门, 要求上一级统战部门“干预”, 进而使他们关注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在与地方官员协调的过程中, 有些牙买加客籍移民没能及时调整心态, 认为自己应当享有某种特权, 私下甚至公开要求地方官员对他们遇到的问题作特殊处理, 从而给地方官员的工作带来不便。但随着政府依法施政水平的不断提高, 地方侨务工作的开展越来越规范。因此, 牙买加客籍移民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加入与地方政府的联系, 在获得众多机遇的同时, 也迎来诸多挑战。

大多数牙买加客籍移民都对家乡政府提供这种政治参与渠道表示认可。蔡宇华在访谈中骄傲地用手机向笔者展示了当日 F 镇电视台有关座谈会的报道视频, 并向笔者一一道出有哪些“大人物”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他们分别反映了哪些问题以及之前他们推动政府解决过什么问题。F 镇某官员表示, F 镇华侨的户口问题就是因为这群“老华侨”不断向上反映、不断要求地方政府予以重视, 才最终得到解决。作为客籍移民与祖籍国进行政治互动的基本路径, 座谈会的形式实质性地帮助了不少客籍移民解决他们在祖 (籍) 国遇到的困难。

(二) 支持祖 (籍) 国的统战工作

海外华人是推动中国实现民族统一大业的宝贵资源。在牙买加客籍移民跨国政治参与过程中, 有的华人利用自己“海外华人”身份上的便利, 迎合祖 (籍) 国地方政府对于统战工作的需求。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积极支持各级统战部门的工作, 表达对祖 (籍) 国统一大业的关注。

陈志安的个案灵活地体现了牙买加客籍移民配合统战工作的活动模式。其父是东江纵队某团的中层干部, 解放前曾作为“地下党”秘密潜入国民党。20世纪60年代, 陈志安偷渡到香港。1978年改革开放后, 陈志安重回老家, 那时陈父已恢复名誉, 并多次获得各级荣誉称号。目前, 除少数留在大陆的亲戚外, 陈志安还有不少建国前移居台湾的亲人。特殊的家庭背景引起了地方统战部门对陈志安的关注。2019年清明回乡扫墓期间, 陈志安被邀请参加统战部门的座谈会, 并在座谈会上接受了深圳市 G 镇第二批“统战队长”的“任命”。陈志安表示, 他是加拿大和牙买加两国的公民, 无比热爱着这两个国家, 但同时也是“中国人”, 祖国的这道“任命”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他希望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为推动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作出贡献。陈志安尽管多次坦诚他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 原本不想参加

这些政治活动,并屡次叮嘱要对其个人信息做好绝对保密。但不可否认的是,参加类似的统战活动给陈志安带来了许多好处。陈志安骄傲地说到,他很早就“小有名气”,每次回乡都会不经意收到各种邀请,这次他即将前往广东肇庆考察。而最远的一次,是和朋友一起去过“北方”的连云港,当时市里面的领导非常热情,首先带他们一行人参观某大型渔场,邀请他们加入投资,之后还派专车带他们游览当地风景名胜。

牙买加客籍移民积极支持祖(籍)国的统战事业,除了能够在交际圈展示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扩大在华人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也能利用海外华人在身份上的便利以及统战部门赋予的特殊使命,提升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进而争取更多利益。

(三) 回国竞选村干部

拥有雄厚经济实力或者在侨乡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宗亲号召力的客籍移民,相比于一般的牙买加客籍移民,他们更有自信地加入各种制度性参政平台,实质性地参与到与祖(籍)国的跨国政治互动。

牙买加客籍移民回国参与农村选举,竞选村委书记、村长等职务,受益于国内农村选举制度的普及。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由村民自主选举产生,为归国的华侨提供了参与乡村基层治理的制度平台。新一批客籍移民在牙买加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与家乡保持着各式各样密切的联系。同时,在牙买加“浅层融入、深层区隔”的社会境遇,导致许多客籍移民在当地普遍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当回到熟悉的老家,“主人翁”意识让客籍移民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寻求通过不同方式对家乡的公共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竞选村干部。

吴丽华就是归国华侨中投身到基层治理的一员。2014年,吴丽华结束在牙买加长达十一年的打工生涯,回到F镇H村照顾家庭。2015年,被村民评价为“有见识”、“有远见”而且热心肠的吴丽华高票当选该村妇女主任,成功加入基层治理的队伍中。吴丽华表示,“能为村民们,特别是村里的姐妹们服务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同时,她认为过往在国外生活所积累的知识与阅历对她来说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有村民就认为吴主任“出过国就是不一样,能力比上一任的妇女主任强很多”。作为侨乡跨国社会互动的主要实践者,华侨村官对海内外乡亲的信息更加了解,无论是在项目引进,还是在慈善捐赠,牙买加华侨村官都能更加精准地动员海内外资源。通过他们的跨国实践与运作,侨乡与海外乡亲联络的管道变得更加通畅。除了受到外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传统上对“衣锦还乡”的追求是华侨村官^[4]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在动力。农村籍牙

买加客籍移民事业有成后,回国担任村干部,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乡间名誉的回归。那些比较早出去的、上了年纪的华侨,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当官”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是光宗耀祖的,不管是国外的老乡回来,还是村里办喜事,大家都愿意请村干部来,这样比较有面子、排场大。

作为华侨参政的一种新模式,牙买加客籍移民回乡竞选村干部,主动加入到基层治理的队伍中,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牙买加客籍移民对于声誉名望的追求,也能对家乡的发展起到积极意义。

(四) 列席政治协商会议

牙买加客籍移民跨国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响应祖(籍)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动员号召。中国中央政府对华侨华人政治方面的动员最主要体现在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列席政治协商会议。

华侨作为人民政协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在政协许多方面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面临的侨情正在发生新的发展,华侨的独特作用得到进一步显现。华侨的参政议政为人民政协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扮演着海外“智囊”的角色。而华侨也能在功成名就后通过政协平台开展慈善捐赠活动,包括灾害捐助和公益捐助等,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和助力政协推行公共外交工作。

2017年6月16日东莞凤岗镇侨联接待来自法国、牙买加的侨领,凤岗镇侨联副主席张文军向客人介绍了凤岗镇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希望牙买加廖子强副会长多组织海外乡亲侨胞回家乡凤岗看看,并在海外积极推介宣传家乡凤岗城市形象。廖子强副会长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联系,推进牙买加与家乡凤岗的交流合作等。地方各级侨联为侨领、归侨等搭建了与家乡互动的制度平台,而致力于家乡奉献事业的归侨也可以通过该平台发挥“余热”。李方军2012年从牙买加回乡定居养老,并于2013年以归侨的身份加入东莞侨联。在东莞地方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李方军作为特邀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关注有关归侨群体反映热烈的民生问题。除此之外,东莞地方政府会邀请他公费前往党校“进修”、下乡调研,或者参观工业产业园、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等。李方军表示,这些“礼遇”是他作为普通老百姓在80年代刚刚出国时想都不敢想的。

华侨通过政协平台从多个领域对祖(籍)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作出贡献。同时,作为海外精英的华侨,在海外的经历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回国之后,牙买加客籍移民可以利用在国外积累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开展一系列跨国政治实践,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跨国政治的空间,对祖(籍)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三、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支持

作为对在牙买加“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社

会境遇的回应,客籍移民主动要求加强与祖(籍)国的跨国联系,以赢得祖(籍)国关注。而客籍移民在牙买加大力发起对祖(籍)国的跨国政治支持,正好体现了客籍移民主动加强跨国联系的主观能动性。他们通过采取包括接待中国各级领导人、形成“爱国统一战线”以及配合领事馆工作等方式参与到对祖(籍)国的跨国政治支持。事实上,由于移民个体的势力比较单薄,他们往往无法以个体的形式在海外构成实质影响力,因而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跨国政治支持活动是以组织的形式进行的。

牙买加客籍移民以社团的形式采取集体行动,包括组织成员夹道隆重欢迎前来牙买加访问的中国领导人、各华人社团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祖(籍)国维护主权等,提升了客籍移民跨国政治支持的效益。这种在跨国政治支持上的凝聚力不仅有利于减轻客籍移民的心理压力和缓解客籍移民实际困难,也可以凸显其社会可见度,帮助客籍移民抵抗来自当地社会的族裔歧视以及扩展经济网络。因此,不同于在祖(籍)国主要以个体的形式加入跨国政治参与,在移居国,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支持主要以社团(集体)的形式进行。

(一) 爱国话语体系的建立

牙买加客籍移民社团通过建立完整的爱国话语体系,表达他们对祖(籍)国的跨国政治支持,这些跨国政治支持活动是建立在与祖(籍)国政治利益互惠基础上的。当这套爱国话语体系与祖(籍)国的外交政策、统战政策等国家战略不谋而合时,它们就能获得祖(籍)国政府的默许与认可,并被祖(籍)国整合为可以利用的海外统战力量,从而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源。牙买加客籍移民社团深知这种政治资源的重要性,一方面,社团的合法性与知名度能够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到社团中来。另一方面,合法性高的社团也能向成员提供更优质的资源,比如接触到更多家乡的官员、了解更及时的商业信息等。

观察一些牙买加客籍移民社团对政治旨趣和政治意义的表达,可以注意到它们从显示与祖(籍)国在政策(如统一战线、维护稳定)上的一致说明与祖(籍)国所期望的政治秩序相符——这暗含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同盟关系。

以牙买加东莞同乡会为例,自同乡会成立以来,无论是在社团宗旨还是侨领对外宣传话语,牙买加东莞同乡会都定位于一种积极的政治态度。牙买加东莞同乡会会长张力坚先生首先致辞,他感谢各界人士在过去一年中对东莞同乡会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龙年来临之际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表示将继续带领同乡会为在牙中国人服务,维护同胞合法权益,促进伟大祖国和平统一。

由于历史遗留和现实原因,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的统一,是海外华人与祖(籍)国政府

互动时频繁涉及的核心政治议题。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也在多次重要谈话中提出,中国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同胞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再立新功”。牙买加东莞同乡会通过话语体系上表达对祖(籍)国重大政治议题的跨国支持,进而整合进与祖(籍)国政府休戚与共的政治利益共同体中。

在面对主流社会排斥的结构背景下,为了更有效地实现与祖(籍)国的政治互动,牙买加客籍移民社团除了将各自的政治态度定位得更加积极,也会在爱国话语体系建设上寻求与其他华人社团的联合,争取实现强强联合,进而扩大它们各自在不同方面的政治影响力。常见的方式一般是华人社团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祖(籍)国的政治主张:

牙买加侨界支持中国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上的正义立场

中华会馆会长 Damian Chin、副会长 Michael Ho Sue、东莞同乡会副会长熊志华、福建同乡会副会长何政等侨领代表纷纷就如何更好维护中国的南海领土主权发表看法,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上的正义立场,号召大家共同保卫中国南海,认清菲律宾仲裁案本质和域外国家强势介入中国南海问题的险恶用心。牙买加华人协会还专门在最近一期的《蓝山侨讯》(英文版)上就南海问题进行专题报道,支持中国政府捍卫南海领土主权。

在联合声明中,牙买加华人社团提炼出“维护主权完整”这一宏大政治目标对祖(籍)国的正面政治价值,并以电视新闻、报纸等多种形式,在牙当地社会和客籍移民社区加以宣传。结果,牙买加客籍移民普遍接受其正面的政治意义,作为积极力量给予祖(籍)国充分的政治声援。而牙买加客籍移民社团也可以从中获得政治利益,分别巩固他们在族裔内部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

(二) 在地与母国政治互动

牙买加客籍移民为了能在当地获得更充裕的社会资源,除了与牙买加政府、当地黑人族群以及老华人群体保持各种必要交流外,他们还需要保持与祖(籍)国在不同层面的实质性互动,作为分散政治风险与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的手段之一。在牙买加,客籍移民与祖(籍)国进行跨国政治互动的主体通常是中国大使馆。大使馆作为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外交代表机关,代表着该国整个国家的利益。客籍移民在地积极参与中国大使馆的各项工作,间接实现了与祖(籍)国政府的政治互动。通过利用祖(籍)国布局在牙买加的跨国政治资源,客籍移民与祖(籍)国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能够及时获取更多有用信

息,帮助他们适应移居地社会。

牙买加客籍移民通过在地政治互动,包括接待来访的中国领导人、支持中国大使馆各项工作等,逐步建立了与祖(籍)国休戚与共的互惠关系。这种密切的政治互动也促使祖(籍)国政府不断推出、调整和完善涉侨优惠政策,以维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侨汇和捐赠以及资源双向流动。^[5]而牙买加客籍移民也能从中接触到海量信息,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同时,彼此之间也在不断协调互动模式,使各自的各新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从而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牙买加,客籍移民发展出丰富多元的跨国政治实践模式,以满足其不同情境下对自身政治利益的关切。他们以个体为单元、或成集体(组织)的形式,在祖(籍)国、移居国乃至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进行人员、资金、信息与观念的流动、转换与整合,以谋求经济利润的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政治风险的分散。由此可见,牙买加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情境性和可变性。

但由于生命历程与经济实力的区别,不同客籍移民在路径选择上是存在差异的,他们不可能参与上述全部的路径选择,只能根据个人的资源优势 and 特点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路径方式。比如,经济效益是首要的考量因素,即客籍移民普遍希望用最少的投资换取日后最大收益回报。另外,最容易实现或者在短期内最可能达成目标的方式受普遍客籍移民的青睐,比如“招待中牙政要”、“参加座谈会”等,而侨领则更青睐于取得“特邀政协委员”的身份。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牙买加客籍移民会根据自身的条件采取不同的跨国实践模式,以满足其不同维

度、不同情境、不同空间下的各种深层次需求。

四、结语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跨国政治实践的频繁发生给牙买加客籍移民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也让其在未来面临诸多新挑战。目前,牙买加客籍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在当地依然存在疑虑的声音,给客籍移民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因此,明确客籍移民跨国政治实践的社会后果有助于消除牙买加当地民众的疑虑。

作为具有跨国性质的国际行为体,政治领域的跨国活动往往会对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客籍移民的全球流动及其借助于跨国网络实现资源重新分配,也有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祖(籍)国和移居国之间的政治利益格局,促使两国思考如何进一步实现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 [1] 王春光. 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161.
- [2] ONG 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18.
- [3] BASCH L G, SCHILLER N G, CRISTINA S B.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M]. London: Gordon & Breach, 1994: 69-70.
- [4] 陈凤兰. 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7 (1): 22-23.
- [5] 周敏, 刘宏. 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3 (1): 5.

责任编辑: 李丽娜

Discussion o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 of Jamaican Immigrants

LI Xiang-yi^{1,2}, CHEN Song-xian^{1,2}

(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Hakka research college,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Jamaican Chinese are mainly Hakka, and their original villages are mainly Dongguan, Huizhou Huiyang district, Shenzhen Baoan district and Longgang district. Jamaican immigrants will take social action to remedy the inconsistency of social status gap in the transnational space and carry out political interac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in different scopes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unit or community. They carry out the flow,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eople,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ideas among countries of origin (nationality), countries of emigration and even other countries (regions), and carry out a series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s to seek the gain of economic profits,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tatus and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risks.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 of Jamaican immigrants have strong flexibility, situation and variability.

Key words: Jamaica; Immigration;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